

教育奋进之笔

降低近视率 应该怎么办

本报记者 田豆豆

核心阅读

我国未成年人近视呈低龄化趋势，估计目前全国近视中小学生超过1亿

学生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特别是电子产品滥用，是近视高发重要原因

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日前，教育奋进之笔“1+1”系列发布采访活动走进湖北，记者获悉，2014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调研与监测结果显示：我国小学生、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的视力不良率高达45.71%、74.36%、83.28%、86.36%。估计目前全国近视中小学生超过1亿，近视率排在东亚和东南亚国家前列。“不仅如此，我国未成年人近视越来越呈低龄化趋势，而且农村学生近视率快速上升，已开始超过城市。”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司长王登峰说。

教育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出台《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提出到2023年，力争实现全国儿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在2018年的基础上每年降低0.5个百分点以上；近视高发省份每年降低1个百分点以上。

导致近视高发的原因涉及学校、家庭、社会等多重因素，降低近视率，真能做到吗？一些地方的有益尝试，让大家看到了曙光。据悉，武汉市92所重点监测学校监测数据显示：学生标准化视力低下率已从2014年的50.83%下降至2017年的45.45%，实现“三连降”。

“人海战术”控近视，人从哪来？

“我负责帮同学查视力，视力‘闯关’成功，还可以积分兑奖品呢！”10月30日上午，在武汉市红领中学校的视力功能室，记者看到六年级学生俞子茜，正坐在一台白色的小机器前，熟练地操纵设备。这台智能化的视力检测设备，可以让孩子在“视防员”指导下自测视力。全校所有孩子的视力数据，则通过这台设备自动录入智能化系统，进入大数据的海洋，成为班级、学校乃至全市近视防控的数据基础。

“我是校级‘视防员’，每个班还有两个班级‘视防员’，协助班主任提醒大家去操场运动或远眺，指导大家用正确姿势做眼保健操等。”俞子茜说。学校大操场上，二年级的小朋友正在快乐地进行体育活动，体育器材是少见的“穿梭拉拉球”、回旋镖、彩带飞盘等，都能让孩子在运动中锻炼眼肌。

“我女儿已经上五年级了，现在双眼视力都是1.2，真的让我很欣慰。学校每学期都由班主任召开几次专题家长会，介绍近视防控知识，要求家长监督孩子少用电子产品，多去户外活动。孩子现在看平板电脑基本不超过15分钟，看电视不超过半小时，已经形成习惯。”红领中学校学生家长罗敏说。

武汉作为全国学生视力健康管理示范区，



武汉市红领中学校学生正在做眼保健操。

本报记者 田豆豆摄



武汉市红领中学校学生在操场上分组玩“穿梭拉拉球”游戏。

本报记者 田豆豆摄

通过10年努力，已建立起一支由专业机构指导、提供技术支持，由学生、老师、校长、家长、医生构成的立体化专兼职“视防”队伍，形成“群防群治”的强大网络。

“近视的发生，除了极少数遗传因素，更多和行为习惯有关。学生长时间近距离用眼，特别是电子产品滥用，是目前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的主要原因。防控近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武汉市中小学生学习视力健康管理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文历阳教授说。

在中小学生学习率“三连降”的山东省，自2010年以来，累计培训专业技术人员、基层防治人员、教师3000多人，培训校医及健康指导老师3300多人，举办家长报告会100多场，参加人员6.5万人次。

专业机构做支撑，钱往哪里投？

“我有一次带女儿来汉口，偶然赶上‘视防中心’做公益活动，带两个女儿一检测，孩子裸眼视力都正常，我本来挺高兴，但专家告诉我，

两个女儿的‘储备值’不足，将来一定会近视，要立刻开始科学防控。我按专家指点，平时注意灯光、孩子坐姿等，经常让孩子打乒乓球，还定期带女儿来‘视防中心’检查和治疗，4年过去，女儿近视发展非常缓慢，专家跟踪指导完全是免费的。”初中生家长沈幼纯感激地说。

她口中的“视防中心”，全名叫武汉市青少年视力低下预防控制中心。武汉市各中小学校的“视防”队伍实际是在其专业指导下工作，有关仪器设备、大数据信息采集和智能预警系统也是由其研发。中心主任杨莉华是武汉青少年近视防控体系的主要创建者和推动者。“救救孩子的眼睛吧！”2005年武汉市两会上，时任武汉市政协常委的杨莉华发出这一呼吁，并联合10多名委员提交了《关于青少年视力健康，创建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治基地》的提案。这一提案引起武汉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在全国率先启动了政府主导、部门协作、专业指导、教育、卫生、学校、家庭、全社会参与的综合管理服务体系。“近视防控，如果完全由政府来做，人力物力投入太大，难以实现；如果交由企业来做，很可能‘变味’。我们武汉视防是政府主导下成立的非营利性专业技术

服务机构，政府‘养事’不‘养人’，由专业人做专业事，成本较低，运作高效。”杨莉华说。

经过10多年锲而不舍的努力，武汉视防不仅建起了深入学校、家庭的庞大“视防”队伍，建立了全市中小学生学习视力健康档案数据库，开展了广泛的科普宣传，而且逐渐摸索出让中小学生学习“不近视、迟近视、慢近视、低近视”的科学路径。山东、黑龙江、江苏、河北等地也设立了青少年视力低下防控机构，构建起近视防控网络。

“我们也走过弯路，曾把近视高危人群、已近视人群作为近视控制重点，但事倍功半。因为近视一旦发生，基本不可逆。所以，现在我们得‘防’放在首位，小学生近视率下降十分明显。”杨莉华说。总结经验教训，她认为，近视防控的“痛点”是不好的社会环境、用人观和学业压力，“难点”在于家长“重治轻防”的错误认知，“重点”在于早期的风险监控。

当然，除了专业机构，硬件投入也少不了。如教室的照明卫生达标、可升降课桌椅的配备、校医务室的升级改造等。目前，全国不少地方都拿出了真金白银。2018年初，广州市启动全市中小学校教室照明设备改造工作，截至目前，市区两级财政共投入经费5.85亿元，涉及设备更新、线路改造、电力扩容等。四川省攀枝花市投入360万元实施免费作业本政府采购制度，每年为11万小学生和初中生采购“防近视作业本”。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强调，“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政府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考核”和“问责”，能实现吗？以近视率作为“考核”“问责”的依据，会不会催生“数据造假”？社会舆论普遍关注。

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王登峰介绍，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2018年基础数据将由国家卫健委组织专门力量采集。另外，教育部每年都要对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抽样复核。“每个省抽样1万名左右学生，是按照随机分层抽样进行的。”

目前，山东省、浙江省、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扬州市等地已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降低学生视力不良率纳入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班级和班主任的考核内容，收到了一定成效。不少有“压力”的学校，在落实课间“阳光一小时”、保障体育课时、提高体育课程质量等方面做得较好。

“近视防控，校内容易校外难。”一位中学校长坦言，考核和问责压力只能从政府传导到学校、班级、老师，但很难撼动家长的“升学焦虑”。目前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断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校内减负校外补”，让学生学业负担雪上加霜。为了减少时间成本，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放学后上网课，进一步加重了用眼负担。老师“零布置作业”了，但有些“家长会”却发动家长给孩子布置作业。如何从入学、升学“指挥棒”上做好设计，加大对学生健康体质的考察权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部署。

“考核”和“问责”，能实现吗？以近视率作为“考核”“问责”的依据，会不会催生“数据造假”？社会舆论普遍关注。

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王登峰介绍，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2018年基础数据将由国家卫健委组织专门力量采集。另外，教育部每年都要对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抽样复核。“每个省抽样1万名左右学生，是按照随机分层抽样进行的。”

“考核”加“问责”，压力怎么加？

《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强调，“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工作、总体近视率和体质健康状况纳入政府绩效考核，严禁地方各级政府片面以学生考试成绩和学校升学率考核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将视力健康纳入素质教育，将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课业负担等纳入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评估体系，对儿童青少年体质健康水平连续3年下降的地方政府和学校依法依规予以问责。”

“考核”和“问责”，能实现吗？以近视率作为“考核”“问责”的依据，会不会催生“数据造假”？社会舆论普遍关注。

在教育部新闻发布会上，王登峰介绍，儿童青少年视力不良2018年基础数据将由国家卫健委组织专门力量采集。另外，教育部每年都要对学生的体质健康状况进行抽样复核。“每个省抽样1万名左右学生，是按照随机分层抽样进行的。”

目前，山东省、浙江省、湖北省武汉市、江苏省扬州市等地已将儿童青少年近视防控、降低学生视力不良率纳入对地方党政主要领导、教育行政部门、学校、班级和班主任的考核内容，收到了一定成效。不少有“压力”的学校，在落实课间“阳光一小时”、保障体育课时、提高体育课程质量等方面做得较好。

“近视防控，校内容易校外难。”一位中学校长坦言，考核和问责压力只能从政府传导到学校、班级、老师，但很难撼动家长的“升学焦虑”。目前很多家长为了“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从幼儿园开始，就不断给孩子报各种培训班，“校内减负校外补”，让学生学业负担雪上加霜。为了减少时间成本，很多家长选择让孩子放学后上网课，进一步加重了用眼负担。老师“零布置作业”了，但有些“家长会”却发动家长给孩子布置作业。如何从入学、升学“指挥棒”上做好设计，加大对学生健康体质的考察权重，有关部门正在研究部署。

张玲在教学中，往往不急于把设计理论灌输给学生，而是常常带他们去观摩。2016级研究生侯雅晨说：“我写论文时遇到一些难题，张老师就带我参观了北京‘无用’空间设计师马可的‘土地’展，在慢慢解读那些充满震撼力的服装设计语言过程中，我找到了思路。”

致力传承服饰中的东方美学

张玲在教学之余，还致力于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无用”品牌设计师马可发起全球范围内“寻衣问道——找寻最有故事的手作衣裳”公益活动，张玲发现的“小红衫”入围10强。张玲说：“这个活动的核心思想是践行‘以衣载道’，一件件饱含温度的衣裳串联起的，是绵延不断的家国情怀、赤子深情。”

2017年，一场名为“不忘来时路”的中国百年鞋履展成为张玲的教学实践场，她带领3名研究生参与研讨互动，通过鞋履探寻其背后承载的人文精神内涵，让学生在思辨中感悟中华服饰文化的深厚底蕴。

2018年，李少红导演的《大宋宫词》进入筹拍阶段，剧组邀请张玲作为服装造型顾问，在衣服的尺寸、尺寸、工艺等方面力求还原历史。张玲说：“我非常愿意做这件事，因为这样可以改善目前国内古装剧戏说历史、不讲究细节的流弊。”

“以衣载道，立德树人，传承服饰中的东方美学，我会一直为之努力。”张玲表示。

凭栏处

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推动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当前，我国中西部边远地区的脱贫攻坚到了决战决胜的关键阶段，师范大学重任在肩，有责任、有使命投身并服务于国家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教育在脱贫攻坚中具有基础性、根本性的作用，是拔穷根、稳定脱贫的前提。我国中西部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长期贫困的原因很复杂，但教育滞后是最终根源。党的十八大以来，中西部教育得到快速发展，但和东部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主要体现在教学质量不高、经费投入不足、办学条件薄弱、教学资源匮乏等方面，而其中最关键的是乡村教师短缺、流失问题严重。

要打赢中西部贫困地区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于培养和稳定一批有能力、有担当、有情怀的乡村教师。师范院校作为教师培养的主阵地，更应有为脱贫攻坚提供强大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的使命担当。

“肩荷使命，矢志报国”，是湖南师范大学一以贯之的办学传统和使命担当。80年前，面对内忧外患的紧迫时局，著名教育学家、心理学家廖世承先生临危受命，率领一批仁人志士扛起教育救国的旗帜，主持筹建学校前身——国立师范学院。80年来，湖南师范大学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先后进入国家“211工程”重点建设大学、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和省共建“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

建校至今，学校已培养了50多万毕业生，涌现了一大批学术大师和各行各业杰出人才。特别是在引领和服务区域基础教育、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等领域，湖南师范大学以实际行动贡献了师大力量 and 师大智慧。学校还着力做好“教育扶贫”“文化扶贫”“文化扶贫”特色文章，驻邵阳绥宁县插柳村开展帮扶3年来，插柳村被评为“全国乡村旅游扶贫重点村”“湖南省脱贫攻坚示范村”，得到了教育部和湖南省委的高度评价。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担当。师范大学在新时代如何投身并服务于脱贫攻坚的国家战略，在脱贫攻坚主战场有哪些新作为？

一是要积极回应时代号召。教育脱贫的关键在于教师。师范院校使命光荣、责任重大，必须牢记师范初心，聚焦教育脱贫的实际需求，为中西部贫困地区培养更多优秀师资。湖南师范大学始终不曾放弃“师范”属性。学校教师教育不仅没有弱化，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加强，每年招收本科师范生约占总招生数的45%，每年师范生约80%的毕业生到中西部地区任教。今年起，还新增公费师范生700人，直接服务湖南农村地区基础教育事业发展。

二是要致力全科教师培养，创新师范生培养机制。为有效缓解中小学教师短缺、学科短板问题，“全科教育”是当下应时之需和必要之举。在课程设置上，要注重打破学科壁垒，进行学科间知识的整合、重构，设置“跨学科复合课程”，拓展师范生知识面和跨学科知识能力；在教学形式上，要注重新媒体技术运用，要改变重理论知识倾向，强化学生教学技能和教师素养的全面培养；在师德教育上，要积极引导师范生树立起面向中西部、服务基层的意识和奉献精神。目前，湖南师范大学正以“世承班”和公费师范生培养为试点，大力推进“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并重的师范类专业改革，努力构建“通识教育课程、学科基础课程、教师专业课程、教育实践课程”有机结合的课程体系；同时，积极鼓励运用“互联网+教育”思维，倡导“反思式”“研讨式”“体验式”教学，切实提高师范生培养质量。

三是要立足教育脱贫攻坚实践，加强理论与对策研究。高校作为人才和知识密集区，围绕教育脱贫中的实践问题，开展理论与对策研究，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和参考是义不容辞的责任。比如，在教育脱贫过程中，如何解决好大班额、乡村教师短缺与结构性矛盾等短板问题；如何创新体制机制，统筹多方力量协同参与；如何激发乡村教育内生动力，调动各类主体的脱贫主动性和积极性等等，这一系列重大实践问题都亟须高校特别是师范大学中优势力量开展专门研究，充分发挥高校的“智库”作用。这些年，学校依托教育科学学院、教师教育学院、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基础教育发展中心等师范教育教研机构，在推进构建“大学—地方政府—中小学校”教师教育模式、开展国际联合培养教师、服务高考改革等方面作了诸多积极有益的探索。下一步，还要瞄准“国家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加快建设高水平、有特色的教师教育学科体系，以更加主动的作为围绕中西部贫困地区教育脱贫中的难点、热点问题开展对策研究。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师范大学要切实承担起新时代新使命，进一步聚焦国家脱贫攻坚战略中的乡村教育，为建设有气质、有品格、有情怀的一流师范大学而努力。

(作者系湖南师范大学校长)

新时代师范大学的使命与担当

蒋洪新

人物志

传承服饰中的东方美学

陈艺文

前不久，中国传媒大学首部沉浸式创意时尚秀“52赫兹的鲸”华丽上演。其中，以中国宋瓷冰裂纹象为灵感的“界”和以中国传统瑞鹤纹样为灵感的“鹤梦千秋”两个主题服装，为观众带来了独具东方美学意蕴的视觉体验。作为指导老师，中国传媒大学副教授张玲说：“让学生们通过服装设计实践去感悟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与博大精深，从而增强对自身文化的认同感和自豪感，是我指导学生从事服装创作的基点。”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精神动力

在这场时尚秀中，张玲指导的两个主题服装作品流露出简约、清新、平易、典雅的艺术气息，营造出现代中国女性温婉含蓄、知性优雅时尚品位。很难想象，“鹤梦千秋”主题中模特所穿时尚感十足的白色喇叭裤的设计灵感，竟来自中国宋代女性的日常服装。

“在设计作品时，张老师启发我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采撷灵感，建议我以国内研发不足的针织女装为切入点，将传统纹样与现代

针织技术相结合，实现古典人文精神的视觉转化。”“鹤梦千秋”的创作者顾安娜兴奋地说：“在张老师帮助下，通过反复实验与探索，最终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界”和“鹤梦千秋”两个设计还得到了“2017年度北京高等学校高水平人才交叉培养‘实培计划’毕业设计(创业类)项目”资助，并通过与针织企业合作，实现了创业转化，为中国针织产业的文化创新提供了新的探索。

怎样才能创作出有内涵、有灵魂的作品？怎样更好地捕捉灵感、确定款式、甄选材料、完善工艺？张玲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本土设计的精神动力。“一方面，我希望学生能在中西文化的双向比较中，探寻现代语境下传统文物的新的表达方式，将传统文化的精神转译为现代服装造型语言；另一方面，我更希望传递出正确的服饰审美观念，为社会提供健康、积极、体现东方美学范式的服饰作品。”她说。

增强学生对本土文化的关注

在夏季小学期实践环节，张玲曾带学生

到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调研，考察那些具有民族地域特色的传统服饰。学生们通过对少数民族聚居村落建筑遗存、传统服饰样态以及民间手工技艺的实地调研，感受到飞檐峭壁的苗寨古建、苍劲悠扬的苗家歌舞、丹寨苗族的蜡染技艺、古法造纸和充满乡土气息的苗绣工艺。

“通过亲自制作蜡染，我感受到了这项工艺的精妙，也体会到民族文化的博大精深。”回忆起在丹寨蜡染的经历，2014级戏美人造型班班长杨艺仍然很激动：“这是我们先人留下的瑰宝，这样的精神财富需要我们一代人去继承发扬。”

采风归来，经过吸收沉淀与创意转化后，张玲和学生们一起举办了“黔行——贵州采风成果汇报展”。大家以服装语言为载体，探索少数民族民间文化在当代的价值表达，在造型、图案、材质等方面做出了许多新的尝试。

“当代设计师应当从自身文化母体中找到‘有意味’的表达方式，这种文化母体就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张玲说：“从感性认识入手，逐步增强学生们对本土文化的关注，是一种很好